

就蘇聯經驗論方言研究方法

中央民族學院蘇聯專家

布•哈•托達葉娃

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印

1955.12.

就蘇聯經驗論方言研究方法

在蘇聯極注重研究俄語及其他各民族語言的方言。在爲某一個族（народность）確定標準語的基礎方言以及確定標準音的時候，必須對蘇聯各族語言的方言進行研究。

對東斯拉夫諸語言——俄語、烏克蘭語和別洛露西亞語——曾進行過極有計劃的和極深入的研究。還在十九世紀的前五十年代已着手研究這些語言了。在這一期間積累了大量的方言材料，它的形式是各專門大綱——問題集（вопросник）的「答案」。這些專門大綱早在十九世紀末葉時就爲科學院所製定，並曾不止一次地發表過。同時在這一期間在全國各地記了許多方言的短文，有了許多科學著作和教學用書，發表了許多專題論文，編著了幾部方言辭典，其中有十九世紀中葉時由科學院所出版的「大俄羅斯方言辭彙試探研究」（Опыт областн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和甫拉季米爾·達列（Владимир Даль）著的「現代大俄羅斯語詳解辭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四卷集，約二十萬詞）。甫拉季米爾·達列這部辭典的材料是一八一九年至一八六三——六六年間收集的，這部辭典的初版也正是在一八六三——六六年間出版的。以後這部辭典又曾再版過幾次，直到現在它還是非常寶貴的材料，因爲它包括了俄語的各個方言。大家知道列寧同志很喜歡使用這部辭典。

但也只有在蘇維埃時代，才對俄語、烏克蘭語及別洛露西亞語的各方言，進行了有計劃的研究，製定了俄語各方言的方言地圖。同時也就是在這一個時期才開始對蘇聯各族所操的突厥諸語言、烏茲別克語、芬蘭諸語言、高加索諸語言、伊朗諸語言及其他語言的各方言進行了仔細的研究。

蘇聯在研究俄語、烏克蘭語、別洛露西亞語及其他語言的方言方面有着豐富的科學經驗。這一經驗就使得有可能指出一些組織各語言的方言研究的一般方法，當然同時也要考慮到這些語言的民族特徵。方言研究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從人民羣衆的口語裏，從文獻裏去收集材料，從理論上去綜合這些材料，從而去闡明每一個語言發展的一般的規律和獨特的規律，因爲每個語言和社會的歷史發展以及和某一方言使用者的歷史都處在複雜的相互關係中。方言研究者面前的任務可以是各種各樣的：或者他的任務是要全面地描寫和研究某一方言並闡明其目前發展的動態（динамика）；或者他的目的是要說明各方言之間的相互關係，說明其分佈的地域及其分類情況。當然，這兩項任務都是重要的，而且是彼此相互關聯的。

蘇聯的一些方言學家都強調指出：在方言研究的初步階段要全面的描寫一個作爲系統的方言，這一點是比較重要和恰當的。像П.С.庫茲涅佐夫（П.С.Кузнецов）教授這樣寫道：「在現代方言學裏提到首位的是：描寫和研究某一個方言的系統，也就是無遺地研究其所有的特點，與此同時並從語言現狀的觀點」。庫茲涅佐夫著「俄語方言學」，國家教育出版社版，一九五一年。索特斯基（С.С.Высотский）

也注意到這一點，他這樣說「在建立方言學的初步階段比較有價值的是要對某一單獨取出的方言進行全面的研究並加以闡明，因為對於許多方言進行總的描述並不能用來充分地深入地說明為某一方言所特有的並具體體現在各基本特徵裏的完整系統，而對其他方言有關方面因為沒有經過研究，因而在缺乏比較的材料的情況下對一個個別的題目進行的研究也總是片面的和表面的。」（見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報告通訊集」第六期第一三〇頁）

當然，根據現狀來描述一個方言的全部系統絕不是不要和其他各方言進行比較，也不是不要和標準語的各事實進行比較。這裏順便說一下，俄語方言學家預先指出：確立一個方言的系統，要求為一個方言確立完整的系統，這都是相對的，因為有許多事實阻撓這樣的做法，這是由於任何一個方言都是不斷地受到標準語的影響，並且也受到鄰近各方言的影響的緣故。

準備工作

1. 收集文獻中已有的全部方言材料並使之系統化

在着手研究某些方言之前，首先應該收集語言各要素在各地區呈現的某些變體的材料（包括形、音、義等）並使其系統化。這裏首先要注意人民羣衆自己覺察到的那些方言差別。這些差別常常是和顯著的人文學方面的特點有關的。例如：一些聞名的俄語方言學家都指出：俄語方言裏的o音化及a音化現象以弗拉吉米爾州（Владими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的邊緣為界限，而這裏正好是婦女特有的服裝在過去流行的界限——主要是北方的無袖女衫和南方的有褶裙子，這是當地的老住戶直接指出的。科學上採用的一些俄語方言學裏的術語，如o音化（оканье），ц音化（цоканье），дз音化（дзеканье）等術語都來自人民羣衆。在使材料系統化的這樣一個準備工作過程裏對地方上各種情況很有研究的人能給予很大的幫助。

研究文獻也是準備工作之一，在文獻中可以發現比較正確地肯定了的方言特點及其地理分佈情況。這指的是語言學、歷史、人文學、地理等方面的文獻。為了達到這樣一個目的，也要注意文字的古蹟、古老的文件等。但是對待民間創作的原文要特別慎重。著名的俄語方言學家，如：П. С. 庫茲涅佐夫教授，Р. И. 阿凡涅索夫教授（Р. И. Аванесов），С. С. 維索特斯基教授等在其著作裏向青年方言研究者預先指出了這一點。像С. С. 維索特斯基關於這一點這樣寫道：「所以要慎重的對待民間創作的原文，是因為民間創作的語言，正像大家所知道的，它並不代表一個方言研究者首先要注意的嚴格的地方性現象。在民間創作中所具有的那些方言形式，有時和敘述這個內容的人的方言完全不同，而是屬於另一種方言。這裏運用這些特徵可能只是傳統而已，可能是取決於作品的風格（例如：重音位置的變動）。」接着С. С. 維索特斯基又說到這一點並不是意味着民間創作對於方言分析一般來講是沒有用的，但是應該記住民間創作原文所有的特殊的複雜性，因為忽視這一點便會對所研究的方言結構樹立一個不正確的觀念。С. С. 維索特斯基繼續說：「所以一個方言研究者應該首要依靠的不是民間創造原文中所吸取的材料（這種材料僅能用來作為輔助材料），而是活的口頭語言的材料。」（見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報告通訊集」，一九五四年第六期第一二八頁）

在俄語方言學的文獻裏對根據民間創作的記錄來研究人民方言特點的問題有着另一種略為不同的觀點。А. П. 葉符根葉娃（А. П. Евгеньева），Г. П. 謝爾久琴柯（Г. П. Сердюченко）教授及其他一些人認為：「民間口頭創作的各具體作品通常是以某一個人民方言（或土

語)作為基礎,帶有為它所特有的語音、語法和詞彙的特點。顯而易見,研究人民口頭藝術創作的語言前要對所研究的著作在語言方面存在的方言特點進行研究。

民間口頭創作的語言不是凍結不動的語言,不是某種特別古老的語言,不是永遠一成不變的語言。人民生活中的任何變化都反映在他的語言裏,首先是反映在詞彙方面。活的語言裏這種新的東西和為人民掌握的新的概念和觀念一起不斷地滲入民間口頭文學,同時這又使得世代使用的體裁發生變化,使得著作中語言本身的組織(речевая ткань)發生變化。」(見Г.П.謝爾久琴柯著「談談頓河哥薩克歌曲底語言問題」,載於「頓河哥薩克歌曲集」第四卷,第四四四頁,國家音樂出版社,一九五四年)。А.П.葉符根葉娃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這可由其研究作品中提到的下面一點得到證實:「口頭作品的藝術語言和詩篇的創造者,使用者的活的語言之間有着有機的聯系,恰恰是活的語言才是藝術語言的基礎,藝術上的表達手段不僅和活的語言一起形成而且和活的語言一起生存和變化,因為藝術上的表達手段和活的語言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系。」(見А.П.葉符根葉娃著「十八——十九世紀俄羅斯口頭詩篇的語言概論」第四——五頁,博士學位論文報告,列寧格勒,一九五〇年)Г.П.謝爾久琴柯的看法同樣也應該認為是正確的,他認為:在為人民羣衆服務的地方方言基礎上創造了許多民間口頭創作的藝術作品。因而很自然地,在研究反映擁有許多歷史事件的人民生活的口頭藝術創作時,我們不能忽略研究活的人民語言,因為它是極偉大的文化寶藏,是交際工具,是發展和鬥爭的工具。許多世紀以來人民在其生活中使用了它。

因此,我們在研究任何一種文藝作品的語言,研究民間口頭創作的語言特點時,首先應該:(1)分析某一人民方言在語法、詞彙、語音方面的特點。因為現在正在研究的民間口頭詩歌正是以這一方言為基礎而生存着和記載下來的。(2)研究藝術表達手段的整個系統,因為這種手段是用來描述作品的,並且是在一個一定的地方方言的基礎上形成的。

當然,我們的任務就是研究口語中的方言特點(語音的、語法的和詞彙的特點)。我們現在並不研究語言的藝術表達手段,這是下一階段的工作。在解決了和確定統一標準語、統一標準音有關的問題後,在研究了蒙古語族各個人民方言及土語的一切基本特點後,才去進行這一項工作。

可見,在工作的最初階段是要積累一定數量的材料,根據這些材料有可能對各方言即使有一基本的了解也好,並根據這些材料了解各地方言的主要劃分情況及從地域上來識別這些方言。對各地方言的各種材料進行初步綜合並應該根據地圖指出所研究語言的各主要方言區的所在地,即使指出一個大概的情況也好。

2. 建立一個統一的方言研究中心

在一個一定的方言研究中心製定調查人民方言的總的計劃。像俄語各方言學家特別注重研究古代東斯拉夫人居住過的和形成俄羅斯部族語言一帶的各個方言,並且也注重研究構成俄羅斯民族語言基礎一帶地區的各方言(這一帶是弗拉吉米爾州,莫斯科州,庫爾斯克州,奧爾洛夫州等)。

收集材料的組織工作一定要由統一的方言研究中心來主持,因為這一工作應該具有羣衆性的科學的性質,它要求進行大規模的準備工作,製訂嚴密的計劃,統一收集材料的方法及其以後整理材料的方法。研究方言的工作在進行時應該具有高度的科學水平,同時在進行時的範圍應該是龐大的——要包括很多地區,深入的調查各方言。俄語方言學家強調指出:最

主要的一點是該工作進行的期限要「儘可能的短些，因為在社會主義民族發展的條件下各地方言每年越來越快地失去自己獨特的特徵，並逐漸接近民族語言經過加工的形式。」（見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報告通訊集」一九五四年第六期第一二五頁）

有許多單位可以參加研究方言這一大規模的工作，根據地方上條件來看，這些單位可以是師範學院或大學的語言學教研室，科學研究院語言部，科學院分部等。

這些機構的責任是：培養一定的方言研究幹部，為收集方言材料的調查隊及個別人出差製訂計劃，進行組織工作並撥給經費。這些機構還應該考慮，如何為整理收集到的材料及發表這些材料創造條件。

負有「方言研究中心」這一責任的機構應經常了解各單位的工作情況；也要時常了解地方上個別研究人員的工作情況；它應該使各單位工作的綱要相協調；定期召集邊區或共和國的方言研究者交流經驗，徵求意見；它還負有召集一定的方言學會議的責任。由此可見，這一機構應該是一個監督各個單位及地方上方言研究者的工作的統一中心。

3. 培養幹部——未來的方言研究者

在採取這樣大規模措施的時候，要求培養將來去收集材料的幹部，培養寫方言專題論文的有高度業務水準的幹部，這些幹部——方言調查的參加者——首先是那些具有專門的語言學知識的人。這一工作要靠每年去各地調查的科學工作者和大學生去做。在組成某一方言研究中心的高等學校裏把參加調查的人組成各方言研究小組，在整個學年中為他們安排好經常的課程，組織專題課堂討論。在這些課程裏要研究大綱內容，練習記錄活的口頭語言，當然對這樣得到的材料可再作分析，這一工作的目的是：使未來的方言研究者能了解到科學地研究方言的方法和技術。

4. 製訂收集材料的大綱

製訂收集方言材料的大綱是方言研究中心的首要任務。大綱的科學水準應該估計到參加調查的主要幹部，即：要估計到那些具有專門的語言學知識的人，而同時也要估計到農村的教員及一般的農村知識分子。例如，在研究俄語各方言的實踐過程中就有過九個大綱。其中有一類大綱帶有一般的性質，包括了語言的各個方面。而其中的另一類大綱具有專門的性質，它們為收集某一部分的材料而準備的，例如詞彙或者是根據詞彙中的一部分的材料（如「收集動物名稱的大綱」）。或者某些大綱是為收集俄語中任何一種方言的材料而製訂的，而另一些大綱只是為某一個州或邊區而製訂的。

以帶有例子的問題彙集作為大綱的組成形式。這些例子應說明方言結構的一切主要的和能作為特徵的要素，也應該說明語言結構的各個部分：語音、詞法、句法、詞彙。大綱中的每一部分的實際材料都應儘可能地使其完整和豐富，不但要考慮到語音現象和語法現象的主要規律，而且還要考慮到許多有關個別詞的發音或者個別詞的構成形式的個別細小部分。但是，基本上在大綱中應該反映出那些說明最重要的方言差別的現象。

自然，只有在對各方言有一個總的觀念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正確地收集問題，並使之條理化，但根據初步收集材料的經驗，根據許多其他方言或是親屬語言論文研究的材料對這些方言的情況還是可以了解到一些的。

能很好的了解大綱及其結構是順利進行工作的必要條件，我們的蒙語調查應該參考蘇聯的這一條經驗。特別是由民族學院蒙語教研組所製訂的大綱，凡是參加調查中國境內蒙古語

言的同志都應了解。

(1) 大綱的範圍是以收集包括方言的各種現象的方言材料這一任務來決定的。要使得以後大綱中問題的答案有可能對所研究的方言系統有一個完整觀念，並在這一研究的基礎上有可能來解決標準蒙古語言的方言基礎及其標準音的問題，因此大綱中問題的組成形式應該是：使得收集材料的人除了記一系列大綱裏已列舉的方言形式外，還能記一些在大綱中沒有的其他的方言形式。在這種情況下，收集材料的人應該在記下方言中的形式時，不要顧及到這些形式在大綱中已經有了，或者在大綱中還沒有。

(2) 大綱是爲了收集任何一種蒙古方言的材料而製訂的。在大綱中應儘可能載明主要的方言差別，總之，大綱中的問題是向研究各種不同的蒙語方言而提的。

由於各種不同的方言存在着各種不同的形式，例如：語音現象或者是語法現象，而大綱如同我們所說的那樣，是爲了研究所有的方言而製定的，那麼當然在大綱中要考慮到各種不同的，而且可能只在個別方言中才出現的語音情況及語法形式。當然，這會擴大一些問題集——大綱——的範圍，但這有利於以後收集到比較完整的材料。

方言研究者在調查方言的語音時，其主要任務是：確定某一個方言的音位系統，這裏音位指的是所研究的方言裏那些用來區別詞義和詞形的基本語音。各種方言的語音結構可能是不完全一致的。在某一個方言會有其他方言裏所沒有的音位。因此，在記語音材料時應把注意力集中在確定某一方言的語音系統這一問題上。卓越的俄羅斯學者 Л. Б. 謝爾巴院士曾指出過：「在研究方言的時候最困難（幾乎也是最重要的）的是：不要記各種細微的差別，而是要從意義的觀點來斷定該語言中哪些特點是重要的，而哪些是不重要的……」（見 Л. Б. 謝爾巴著「俄語元音」第一九頁）

(3) 在大綱中對某些現象應盡量多舉些例子。例子應該涉及到那些廣泛使用並很普及的詞。對收集材料者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除了在大綱中已有的例子外，還要記述許多在大綱中所沒有的例子。豐富的例子可幫助我們以後更好的去理解方言的特點。應該事先說明，教研組的同志並沒有對大綱的每一部分都提出問題，如「詞彙」部份的二千五百個詞基本上是按題目的原則來進行分類的。

應把許多引用材料附在大綱上，因從這些材料中可以知道研究方言的目的及任務，收集大綱——問題集——每一部份材料的統一的方式和方法以及統一的音標等等。

當然，研究蒙語方言大綱的製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第一次，不會沒有缺點或不準確的地方，但在進行調查的過程中，毫無疑問，這個大綱會得到修正和補充。

研究方言的方法

在敘述有關研究俄語方言方法的許多問題中的最基本問題時，我們認爲：了解這些問題將促進你們在各個地區勝利地進行蒙古語各方言的研究工作。

1. 選擇調查對象

調查對象的選擇必須依據方言研究者提出的目的。如果方言研究者提出的是歷史任務，也就是收集語言歷史的材料，那麼他首先必須注意請那些在最大的程度上保留了舊成分的方言的當地居民。但是俄語方言學家預先說到：即使是收集語言歷史材料也需要對先進居民講的語言進行調查，以便對該方言體系在目前存在的形式有個客觀的概念。

如果方言研究者提出的任務是：描寫在發展中的語言，說明整個語言結構的客觀情況，那麼研究語言時就必須在所選定進行調查的居民點裏盡可能和不同類型的居民多多接觸——先進的和落後的；年老的和年青的；男的和女的；以及有不同的職業和專長等人。

方言研究者在實際工作中可以和不同的語言環境接觸。蘇聯方言學家指出：如果認為好像集體農莊莊員們的社會發展水平和方言水平之間有着一種直接的聯系，好像農業積極分子，如工作隊長，農業先進分子一定是講這個方言的先進階層的人物，而其餘的莊員一定是講舊成分多些的方言的人物，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

為什麼這樣的見解是不對的？一位蘇聯方言學家C.C.維索特斯基這樣解釋：

「問題是在農莊莊員們的社會主義覺悟和文化的發展比較口語的方言特徵的消失要快得多。這說明了語言結構固有的穩固性。是的，積極分子在社會上的先進地位促使他們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因為他們書讀得多些，常上專門訓練班學習，常在會議上發言，常到其他的農莊去，城裏去交流經驗及提高技術水平。所有這一切都為他們造成了更快地改變口頭語言的條件。但是這是第二屬性的因素，因為口語中方言成分的消失那是時間的事情。」（見C.C.維索特斯基著：「研究方言的方法」，發表於蘇聯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出版的「報告通訊集」一九五四年第六期第一三四頁）。

無疑地，方言研究者必須調查清楚和估計到：在某一個居民點根據文化程度和年齡的特點來說，講本地話的人有那些類型？他們各講那一種類型的本地話？因為只有通過操這個方言的社會的歷史方能了解方言的現在情況和它的歷史。因此，在選定調查對象之先，必須注意屬於不同類型的本地居民在口語方面的差別。

2. 方言調查者的工作條件，對方言調查者的要求

方言研究者在農村的工作是非常重要和困難的。在對當地居民的關係上要求方言研究者很機智和謹慎，到達地方的第一個任務就是使人家對自己信任並和當地居民建立起友誼關係。根據俄語方言學家的經驗，最好是當方言研究者到達農村時，就和當地的一些機關建立聯系，和學校教師以及當地的積極分子建立聯系，通過當地的積極分子然後和當地居民接觸。以後就應從這些居民中選出調查對象。

如果由當地一定的機關介紹方言研究者和居民認識，那麼這將促進到達當地的方言研究者和當地的居民建立必要的聯系。然而，俄語方言學家認為這樣還不能和當地居民建立起充分的聯系。方言學家認為：方言研究者本身必須花不少力量來擴大和鞏固這種聯系。P.И.阿凡涅索夫教授寫道：「首先他們不應該和農村，集體農莊的社會生活和生產生活隔絕。要讀當天的報紙；解釋黨和政府當前的決議；召開政治問題的座談會，例如國際政治問題座談會；指點當地教師和參加調查的青年的工作；有時要參加集體農莊的勞動，即使是幾次，但是要親身參加；給老太太寫信或者是告訴她關於領取養老金的手續等等——這都是方言研究者參加當地生活的一些可能的方式。」（見P.И.阿凡涅索夫著「俄語方言學概論」第一部分，第二四九頁，一九四九年版）

自然，也不應該認為每一個方言研究者對各種工作方式都應採用，對方言研究者的要求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參加當地的生活，要對當地發生興趣。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取得當地居民的信任，並在當地居民中建立威信。當然方言研究者參加當地經濟和社會生活的程度可以各有不同，這要看他們在某一居民點逗留的季節和期限來決定。

3. 告知當地居民來到的目的

俄語方言學家認為這個問題有着重大的意義，當然很多情況下在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要看工作的具體條件，方言研究者自己可以在地方上解決這個問題。很多俄語方言學家的經驗證明：方言研究者如果說自己到此地來是爲了研究當地的歷史，研究這個農村的歷史，是爲了收集舊的風俗習慣及傳說的材料，是爲了研究生活，農業生產，各種副業生產，以及語言等等。這樣講法使當地的居民最容易明白。當然，不能認爲當地居民不能不知道我們來此地的真正的目的，以及他們的語言就是我們調查的對象。因此最好是以地方情況以及有關生產和生活的事情作爲談話內容以便進行調查。這裏可以介紹一下談話的內容，如：這個農村的歷史，對本地區的描述；周圍的村子，區中心，城市，交通綫；農業生產工具，田裏的勞動，畜牧業和目前農村裏一般的生產情況；捕魚及打獵；對建築的描寫（房子，從事副業生產的建築），傢俱和器皿，烹飪（飯菜），古老的儀式（例如婚喪等事）以及其他等等。俄語方言學家的實踐也證明了：其中一些項目和男人談合適，而另一些項目找婦女談合適。有些項目要多和老年人談，而另一些項目則要和青年人談。當然，還要會從這些題目中選出對當地，當時，及具體的人最有意思的題目作爲生動的談話內容。

4. 收集關於農村的一般材料

收集農村及其居民的一般材料對於方言研究有着重大的意義，這些一般材料會有助於更好地去認清和理解方言研究者所收集的語言事實及闡明這一方言的發展道路。

首先，應該記下居民點的正確的名稱，它屬於哪一區，哪一省，指出這個村和最近的火車站，碼頭，城市，區中心的距離，並指出其方向（如：往南去，往西北去等）也是有用的。要指出該地區有那些文化機關，建立多久。俄語方言學家一再強調：從這些材料中可能得到該村歷史及其居民歷史的所有材料（如：這個居民點存在多久，這些居民從何地來的，當地居民屬於那些社會階層）。必須要了解當地居民是否有其他的名稱，還應該注意該居民點是否有本地檔案材料，如果有，那就應該了解這些材料的內容。

5. 對方言進行實地的初步研究

應向多少本地人進行語言調查？需要多少方言研究者進行方言研究工作及如何更好地來進行方言研究工作？

俄語方言學家在這些問題方面的經驗說明了以下幾點：

（1）到達地方之後，方言研究者首先應該用一些時間來仔細的聽聽方言。對該方言必須有一般的概念，在一定的程度上要滲入到這個方言裏去，體會這個方言的體系，然後便可以爲調查選擇一典型對象。這種預備階段的長短根據方言研究者的目的來決定。如通過實踐對方言有一初步了解後，是會有助於更全面地來研究方言系統的。其次在和調查對象的交往過程中即使能部分地使用當地的方言也好，因爲這有利於方言研究者和調查對象間的聯系，如果方言研究者已掌握了當地的方言，那麼在談話中應多多地使用這種方言來收集材料。

（2）應向多少本地人進行語言調查？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可根據方言研究者的目的而有所不同，如果必須要詳細地描述方言的整個系統，那麼，當然要求對講這個方言的許多人進行調查，而且這些人必須是屬於當地各個不同類型的人。例如：如果要根據俄語研究所的大綱收集材料來製定方言地圖，那就要求去描寫舊成分保留得比較多的本地話，大半是老一輩人講這種話。當然在這裏還需要從當地居民其他類型的人物中去收集補充材料。因而，在

這種情況下作為調查對象及提供材料的人數不應該太少，關於這一點俄語方言學家預先指出過，在記方言材料時不應只根據一個人來進行調查。因此，關於這個問題 P. И. 阿凡涅索夫教授指出了以下這一點：「在某個村子裏記方言材料時，甚至是根據大綱也不能只向兩個人來進行調查。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不能確信所收集的材料是否真正的包括了該村方言的特徵，也不能確信這不是某一個人講話時的個別特點。」（參看 P. И. 阿凡涅索夫原著「俄語方言學」第二五二頁）

調查對象的數量應由居民點的大小來決定。如果在一個居民點中有一千多戶（如在蘇聯的南方），那麼，為了證實該居民點的語言是劃一的以及所選擇的對象是典型的，當然必須向很多人進行語言調查。俄語方言學家指出：就是在居民點不大的地方調查對象也不應少於三、四個。

還應該估計到有時候在一個人口很多的居民點裏的方言特點可能是不相同的，即不同的方言特點可能分佈在一個村子的兩「頭」，如俄語方言學家就指出：在莫斯科州，梁贊州，平茲州等地方就有這種情況。

（3）根據很多俄語方言學家的經驗，可以認為：幾個調查者在同一時間一起進行方言調查工作是最方便的方法。主要由一個人來和別人談話，而由另外一個人來記。有時在進行調查時需要多一些一起參加，在每一個組裏最低限度應該有一個有經驗的調查者，這是很重要的。

同時，當進行方言調查時，調查者本身應該盡量少說話，他的責任只是主持這樣一個談話，向別人提問題，使這個談話能符合需要。如果到了沒有話可談的時候要及時改一下談話的內容，方言研究者在談話時最好記連貫的話，但記的材料仍要正確。一般地說，方言研究者應和記應該比自己說要多。我們還應創造一些更好的條件，如果方言研究者不參加談話，只是調查，這便是最好的條件了。調查者可以在當地居民彼此交談時，在當地一些組織的會議上，在集體農莊的會議上來聽別人講話。如果調查者在當地的某一家住下來，這一家的人就可以作為他的語言調查的對象，在他們交談時便記錄，這是特別好和特別方便的辦法。調查者與他們相處在一起，和他們交往，每天都聽他們之間的談話以及聽他們和自己鄰居之間的談話，這樣他就可以得到特別可靠的材料。

6. 記寫連貫語

在最自然的生活或勞動的環境裏記活的、連貫的口頭語言是收集材料的主要方法。同時不僅應該記單獨的句子和詞組，而且也要記一些單個的詞。俄語方言學家指出：最好經常記一些一大段一大段的連貫短文，因為在這些材料中比較完整地反映着方言的特徵。但要記這樣一些短文，尤其是對初次從事方言研究的人來說會使得所記的材料不太正確的，因而得到的會是一些「千篇一律的材料」，也會得到一些有時候是不正確的材料，這樣的材料會使方言研究者的全部工作失去價值。

如果方言研究者要得到最完整的、最典型的方言材料，他就不應該提出自己想要的形式或是詞，而是應該從調查對象的口語中直接聽取自己所需要的材料。由此可得出結論：收集基本材料時，不應該用訊問的方法，不應該用直接提問題並由調查對象直接回答問題的方法，而應該用考察當地居民在很自然時講口語的方法。應該盡可能的避免直接提問題，如：「你們那兒是這樣發音嗎？」「你們那兒用這樣的詞或者這樣的形式嗎？」等等。當然類似

的問題可以用一個字來回答，如「是」或「不是」，「說」或「不說」。這種直接提的問題所得到的回答不會永遠是正確的，因為特別是在被調查者和方言研究者作了長時間的談話之後，由於疲倦，經常是所答非所問，或者說一些在他們認為是方言研究者所希望的回答，或者是使他們的回答符合在他們認為是「受過教育的」人講的城市語言。

一般來講方言學家都知道：在和講本地話的人交談的時候對於語言很多的要素（尤其是語音和詞法部分）不要直接地提問，而更不要以直接的問題來提示要怎樣回答，因為這會使得回答只是機械地重複方言研究者本身的發音，使得回答只是或多或少有意識的在模仿方言研究者本身的發音。

在對方言各單獨方面——語音、詞法、句法——進行調查時，一般不應採取直接提問題的方法來收集主要材料。但這不是說在一定的條件下也完全不能使用這種方法。俄語方言學家認為：方言研究者的機智，善於掌握分寸的能力，和調查對象進行談話的能力以及提啓發性問題的才幹，都決定着工作的好壞。

有時對當地居民日常講的活的口語的記錄，只是對當地居民的口語進行一種消極的登記而已，這並不能揭露出所研究的某一個方言在語音、詞法、句法方面的全部詳細特徵。

方言的某一類要素（如語音方面）在開頭的幾句話裏便可聽到，而方言中還有另一類要素（如詞法、詞彙），由於各種不同的原因，在活的口語裏，在連貫語裏極少遇到，甚至有時根本就遇不到，因為在講話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理由非要去運用這些要素不可。

因而，在工作的最後階段，那時基本材料已經收集完畢，方言研究者已經和當地居民，指定作為調查對象的居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要了解在記連貫口語的過程中由於某種原因而沒有發現的方言結構的一些重要因素，一般是採用專題的談話方式和採用提啓發性問題的方式，自然，在提啓發性問題的時候，方言研究者必須選擇問題，使得他所提的問題能達到這樣一個目的，即：在他提的問題的回答裏一定要有所需要的詞和所需要的詞的形式。在提啓發性問題時的困難是：方言研究者自己不能使用他所需要的形式，以免影響調查對象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所說的話。

俄語方言學家指出：在進行調查的地區，常常遇到這樣的人，甚至是年老的，沒有文化的人，但是他們對語言出奇的敏感。雖然他們沒有語法概念，但能很快就猜到對他們問的是什麼和對他們的要求是什麼，並且會很快地「變格」和「變位」，把需要的詞放在句子裏。

在利用講該方言的，對語言生來就是敏感的人的觀察力的時候，在較直接地對他們提出某一個詞的發音問題及在方言中很少遇到的某種語法形式問題的時候應該謹慎些。從他們那裏收集來的材料必須在很自然的談話中加以檢驗。

Р.И. 阿凡涅索夫教授指出：「如果您要從 пеку（烤）這一詞知道不定式和其他許多形式是怎樣形成的，那麼您就把話題引到烤麵包這一問題上來。這個動詞的某些形式很容易遇到，而另一些形式總是不出現，這時可適當地提一些啓發性的問題。當看到婦女在烤麵包，時您就問她：「老太太，你在做什麼呢？」「我在烤麵包啊！大叔」「奧林姆大媽現在在做什麼呢？」「誰知道啊，大叔」「那她是不是在買麵包啊？」「不，大叔，我們這兒沒有烤好的麵包，是她烤的。」（烤這動詞在這句話裏是第三人稱——譯者按。）（見Р.И. 阿凡涅索夫著「俄語方言學」第二五七頁）Р.И. 阿凡涅索夫進一步指出：如果方言研究者必須了解動詞 запрягу（駕〔馬於車〕）的一些形式，那麼他可以和當地居民談談馬，以及

使用馬的一些情況。這樣方言研究者就能聽到他所需要的『запрягу』這動詞的一些形式。

然而，俄語方言學家預先談到：專題談話方式以及提啟發性問題的方式不可能一定會達到我們所想的目的。因為這些方法的細緻地方是不能預測的。

有時達不到目的是因為調查對象總是有權利把他自己所需要的詞選在句子裏，這樣就可能和方言研究者所需要的形式不相符合，有時調查對象可能使用代詞來代替方言研究者所需要的詞的形式。爲了達到目的，方言研究者必須想出這樣的問題，使得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使用方言研究者所需要的詞和形式。

因此，當需要採用專題談話和提啟發性問題的方式來收集所缺乏的材料的時候，方言研究者不應該講自己所需要的詞或形式，而是使用調查對象以前講過的並爲方言研究者記下來的那些詞。

但是上面所講的並不是說詢問的方法和直接提問題的方法在工作中絕對不能使用。

問題是在於語法的各個不同部分有時要求採用不同的方法來收集材料。

收集語音和詞法材料的時候可以根據一個題目隨便的、無拘束的和當地居民交談，在這樣談話的過程中把話記下來，同時爲語音部分所收集的材料對詞法也會有用。因為語音的材料也需要記一些短句子或者是短語。在爲研究句法而收集的材料中也可以選出一些詞法所需要的材料。但是這並不是意味着，詞法部分不須要作專門的調查。這裏還應該提出，在爲語法各個部分收集材料時不應該只記單詞。

在研究詞彙方面，如果需要了解在農村地區所遇到的各式各樣的物體的名稱，在親身接觸到這些物體的時候「直接」提問，一般是有效果的。在這種情況下，提些問題是完全合適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如「這是什麼？」「這叫什麼？」但不應該認爲直接提問的方法對於整個詞彙的研究是完全合適的。毫無疑問，在暢談時收集到的材料應該是很寶貴的，因為在這些材料裏所需要的詞是出現在上下文裏，出現在自然交談的環境裏，如當地居民相互之間的談話，在會議上的發言等等。對於沒有實義的詞彙並不能使用「直接」詢問的方法（例如：「很」這個詞）。

因此，詞彙的部分材料可以通過直接詢問的方法來收集，而詞彙部分中相當多的材料可以採用爲語音和詞法所收集的材料。

如已談過的那樣，可以用直接向調查對象提問題的方法來收集一部分材料。同時最好簡要的記一下和某一些詞有關的各物體或生產過程。當講本地話的人談某一物體的時候，當他們在解釋在生活和生產中如何使用這一物體的時候，最好把他們在談這一物體的時候所作的解釋都記下來。這些解釋詞彙的材料，會給闡明語法中其他部分——語音、詞法、句法——提供大量的材料，同時還希望在記材料的時候畫圖和照像，例如：傢俱、衣物、各種的建築、農業生產工具等。甚至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畫院子的平面圖，屋子裏房間劃分的平面圖、傢俱的安置圖及其他等等。

俄語方言學家認爲調查中最感困難的一部分就是句法。他們得出這個結論的根據是：句法方面的調查要求方言研究者記一些連貫的短文或者記一些完整的句子也好。要得到所需要的、能作爲某一方言特徵的短語及句子結構的材料，自然要儘可能地多記一些上下連貫的短文。

只有根據所記的大量材料才可以闡明某一個方言的句法構造。在研究方言的句法特點及

詞法特點方面，記下來的民間口頭創作——歷史傳說、民間童話、各種故事、諺語、俗語等——可提供很多材料。希望再記一些關於和帝國主義、日本侵略者鬥爭的故事，記人民解放軍的功績，記參加為解放祖國的鬥爭的故事，記新生活等等。

總之，在最自然的環境裏記活的口頭語言是收集材料的主要方法。因此，要事先告訴下去收集蒙語方言材料的同志們不要去犯可能犯的一個錯誤。問題在於，同志們正是要在被調查人發音時，在同志們聽到這一發音時來記材料，而不是過一些時候憑記憶，憑對方言的總的印象來記所聽過的東西，這是不能允許的。記材料的過程中，在記一短文時至少同時要由二個人記或是二、三個人記，這是特別重要的。

語音符號

使用語音符號是為正確地表達語言的音位結構，而有時是表達音位的色彩。各個別的方言和土語的音位系統與標準語的音位系統，與其他方言的音位系統是有差別的，所以必須要有這樣一套符號來記語音、詞法、詞彙及句法的材料。

然而應該指出：要從語音的觀點來記寫對於句法特別需要的連貫的短文，這甚至對有經驗的方言學家來講也是一件困難的事。

但由於我們的任務是發現所研究的方言及土語的音位結構和各個方言間主要的語音差別，因而我們盡量製定一些簡單的符號，所以就採用了現代喀爾喀蒙語的實用字母表，並在這個表中補充了一小部分為表達中國境內的蒙古土語和方言的語音特點所必需的字母。

如果一套語音符號可用來記一切的方言材料，那麼一般認為這是合乎理想的。

在蒙語調查的實際工作中將使用中央民族學院蒙語教研組所採用的那套符號，現已根據這套符號進行了專門的學習，想必同志們已經熟悉這套符號了。

實行登記制

在記錄方言材料時，無論何時都應該指出，這些記錄是從誰那裏記來的，他叫什麼名字，父名是什麼以及姓什麼。關於調查對象我們應有以下的材料：年齡、性別、文化程度、工作性質、職業或者是專業；頂好還能了解這個人是否到過其他的地區或城市，在那裏住了多久、從事於什麼工作。

在每一份記錄的前面都必須標出，這份記錄是從誰那裏記來的。俄語方言學家指出：在進一步整理材料的過程中，這些材料要按照調查人員向每一個人所記的材料而單獨整理。他們並指出：這樣來區分從各個不同的人所收集的材料將幫助研究人員把這個方言裏的典型的、特有的材料和那些偶然的材料區別開來。如果從不同的人那裏收集來的材料中不存在差異時，才可以在以後描述方言時把這些材料合在一起。

不實行精確的登記制，方言研究者就不能確定方言的系統，不能確定哪些成分是不在該系統的範圍之內的。

整理方言材料

必須在當地整理材料，把材料分別地列入語音、語法、詞彙等部分。這一工作要每天根據所收集的材料來進行。這種對材料的初步整理工作使方言研究者有可能及時知道大綱中的哪些問題，哪些部分已有足夠的材料，而哪些部分的材料還不夠或是完全沒有。方言研究者要很注意收集得不夠的材料。方言研究者收集材料這一工作應直到一切主要的語音、語法和詞彙現象都得到闡明為止，直到大綱所有的問題獲得解答為止。

如果在地方上對所記載的材料不作初步的整理，或者是對這些材料的整理工作是在進行調查之後一個較長的時間後進行的，那麼等調查回來之後往往記的某些材料是沒法讀出來的。有時這會造成所收集的材料中有很大部分無法使用的後果。

如果在調查回來以後才着手整理材料，那就往往會發現：材料收集得不平衡，有些問題的材料收集得非常多，而另一些問題的材料是什麼也沒有收集，或者是收集得很少。

毫無疑問，如果在地方上早發現這一點的話，那就可以及時進行補充調查和收集一些必需的材料，補充一些材料和回答大綱的一些問題。

回來後整理材料時不可能增補我們所缺乏的材料，因為要得到這樣的材料便要再一次地到地方上去收集。

俄語方言學家爲了想整理回答大綱問題的材料，做了許多的卡片，在卡片的右上角指出居民點的名稱，卡片的左邊是大綱問題的編號。

可以把調查者針對大綱中某一問題所記的例子轉抄在這些卡片上。從某一個人那兒記來的一些例子下面在括弧裏註上一個號碼，根據號碼可尋找寫在名單裏的關於該調查對象的材料，如果不知道例子是從誰那兒記來的，那麼在括弧裏就必須以x（未知數）代替號碼。而且，如果我們調查某一個人講的方言時，發現他對某一個語言事實（詞，詞組或者是句子）重覆了好幾次，那麼我們要把這些次數寫下來。在把材料整理到卡片上時要把他所重覆的次數記下來。但是也有相反的情況，有時發出聲音的語言事實雖然被幾個調查者記下來，但是在整理材料時必須只指出一次就夠了，不要造成以爲該詞用的次數很多的印象。

調查者應按照這些卡片所收集的材料範圍進行檢查，以便指出有些問題的材料還不夠，或者是沒有。然後根據這些問題進行補查，一直到不必再收集必需的材料爲止。

卡片必須是同一個格式。如果一個問題的材料很多，而一張卡片又寫不完，那麼應該用第二張或是第三張卡片。這些卡片要寫上大綱裏同一個問題的編號，並註上「第二」或是「第三」。在這些卡片的左邊要留出約二公分左右的空白地方，以便在工作結束時，按照每一個居民點把材料訂成一個一個本子。

以上所說的一切說明了方言研究者肩上有着何等特殊的責任。方言研究者的工作是不可能檢查的，也不可能監督的。因爲口頭語言的調查僅僅是在聽發音的時候才能進行，因此，方言材料的記錄不能由其他的人來檢查。經過一定的時間以後，在另一個時間和另一個環境裏進行複查時有一些和第一次不同的發音，和以前記錄不符合的發音，因此，方言研究者在自己記錄時必須非常謹慎和準確，以免迷惑不清和在科學上引起不正確的結論。

在講「研究方言的方法」（根據蘇聯研究方言的經驗）這一講裏，我們敘述了最基本的方法，但力求說明調查方言的全部準備工作以及在研究方言期間的工作。當然，這裏所提到的每一個問題都可以談得更多，更爲詳細。在其他一些同志講這個問題時，必然會對這些問題作一些有意義的補充。這次所組織的蒙語和其他語言的調查工作中可以充分運用俄語方言學家的經驗。